

近代中国茶业的开拓者 唐翘卿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特产“茶叶”（特别是红茶），经过洋行向欧美大陆、中东大量推销。由中国茶农用各种方法泡制而成的红茶、青茶、花茶，经过了长时间比较，以其独特的色、香、味和茶叶本身富含的大量对人体必需的重要元素，对人体生理上起到比咖啡、可可更良好的作用。因此，被人类公认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

由于当时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最大供应国，而茶叶产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也是当年“洋行”较集中的地区。在“洋务运动”中兴起的“洋行买办”，对于发展茶叶的制作、收购、推销这三方面，都在历史上起着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买办与洋商（华商）在茶叶经营中也获得巨大的利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当年的《伦敦、中国快报》（1882年9月1日）引用了一篇洋商的“笔记”，把这种不等价的交换过程，作了一次简要的披露。

唐翘卿家族

唐翘卿族名高亮字国泰。是唐家村唐族“豪杰房”廿二傅裔孙。父亲唐懋勋，母亲黄氏，兄弟四人：高谕、高亮、高稳、高鉴。

唐翘卿有子女共十六人，其中七人早夭。余九人中有四人留学美国，都有成就。他们是：

十一子唐叔璠，曾任驻菲律宾吕宋岛领事，离任后任华茶公司副总经理及中茶公司副总经理。

十二子唐叔珲（叔平，瑞华），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汉阳钢铁厂工程师，胶济、正

太铁路机务段段长、课长，上海中央造币厂工程处处长，中山港筹办委员会委员，重庆钢铁厂工程师。

十五子唐季瑚，是经济学家，曾任汉口美商麦加利银行秘书及助理行长。

十六子唐季珊，毕业于美国，习商科。继承父志，于民国八年将汉口、九江、上海三处茶栈合并，创办了“华茶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总行设在上海博物院路十六号（旧地址）。美国分公司负责人，唐乃添（叔璠之子），香港分公司负责人唐乃祥（伯璇之子）抗战胜利后在台湾开设分公司由唐季珊兼理。

唐翘卿的子孙有百余人，现职的有西南铁路工程处工程师唐乃斌。旅居香港的有唐乃林等五人，居住台湾的有唐乃章等五人，居住上海的有唐乃强、唐乃安、唐乃多等五人。

唐翘卿的生平

道光廿一年（1841）唐翘卿出生在唐家村一个农民家庭，有兄弟四人。由于家计贫困，母亲因生育过多而早故。父亲唐懋勋勉强将四个儿子抚养长大成人。因家境贫苦，唐翘卿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务农。父子五人，艰辛度日，在亲友的关怀下，他十四岁便只身离家到上海一间茶庄学艺，在交往中认识了当时在海关做事的同乡族叔唐景星，从他那里学习英语和日常商务活动的知识。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学习和工作，得到东主的器重，职务不断擢升，由学徒升任为“跑街、坐庄”。由于他经常到各省产茶区做收购茶叶的工作，逐渐熟悉了制茶的工艺，被同行一致推荐为“老行尊”。民国初年，汉口茶业英商新大信洋行的资料中有“唐翘卿氏乃中国茶业的拿破仑”的记载。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对中国茶叶的总需量激增，“洋行”纷纷拨出巨款，通过“茶栈”的媒介去收购茶叶。大量的“茶叶信贷”从各处银号发放。当时，只要某间被认为“殷实可靠”的新茶栈成立，各处银号会在财政上给予信贷。史料记载：“大凡新创一栈……各钱庄莫不纷纷送摺，每庄往来动辄一二万或三四万两，不但汉口钱庄如此，沪上诸庄……亦竞放茶栈银两……”（《申报 1889 年》）

唐翘卿就是把握这个时机，辞去原来的职务于 1867 年在九江开设“谦顺安茶栈”，并通过族兄唐瑞芝（汉口俄商阜昌洋行买办，厚生祥茶栈东主，有茶王之称），在汉口分设分号。一年后（1868），又在上海开设了分号。通过唐景星的关系，他认识了更多的茶商和买办。

1868 年（同治七年），上海茶商出于商业竞事的需要，成立了“上海茶业公所”，唐景星、徐润、唐翘卿都是董事。（《徐润年谱》）

前面讲过，在茶叶的购销过程中，茶商与茶农之间进行的是不等价的交易。因此，唐翘卿的财富迅速增加，使得他更有条件去从事各类商业活动。1868 年底，他又将上海的分号加以扩大，开设了“恒顺宏茶栈”。

唐翘卿的商业活动

投资仁济和保险公司（1876—1886 年的十年中总资本达一百万两）：合并以后的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主要都是来自买办。它的主要股东除唐景星、徐润、刘绍棠、陈树棠以外，还有麦加利银行买办韦华圃、柯化威洋行郑廷江（郑官应叔父）、汇丰银行买办唐国泰（翘卿）（《申报 1876—1879》）。这时候，

唐翘卿的买办资本已经开始向民族资本转化了。

1883年，唐翘卿与唐应星（景星弟）、徐秉诗（徐润侄）投资开采安徽省池州煤矿。

1888年，与唐景星、唐芝耘（唐宝锷父亲）合资参与上海地产事业。（《唐廷枢研究 171 页》）

金融业投资：光绪初期，唐家村梁族、上栅村梁族、会同村莫族，联合在沪汉的富商，集资创办了一个财务集团，取名“江西会”。唐家村梁族以水田五百亩注资（上栅梁族、会同莫族资产多少不详），唐翘卿也有参股（数目不详），在香港、唐家分别开设了“维新银号”来管理日常经营事务，聘请当年任香港东华三院总理梁锦昭（唐家梁族）任维新银号司理（总经理）。

有关“江西会”的财务运作有列资料：

1、光绪十二年（1886）唐家团练局向江西会借款壹万陆仟壹百伍十两作为团练基金。

2、光绪三十四年（1908）贷给香山县上恭都“金山书院”重修费壹万余两。

3、民国九年（1902）唐翘卿家信中谈到：“远达侄代我管江西会……亏空公款”。

4、民国廿年（1931）唐绍仪在中山县政府会议中提出“向江西会借款扩建岐关支线……”

从上述资料来看，唐翘卿的商业活动是多方面的，也是“洋务运动”时期“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具体史例。

华茶公司的创立

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者的商业资本卷土重来。当年，英国经营了近三十年的锡兰（斯里兰卡），种茶、制茶事业也获得

成功。英商为了打击中国茶业，以遂其垄断国际茶业市场的心愿，除了利用不平等条约阻止华茶外销的同时，把大量的“西冷红茶”（西冷是锡兰的英语译音）贱价倾销中国，企图以此来扼杀中国的制茶事业。面对国内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国外受到“西冷红茶”倾销的竞争，中国传统的茶业市场受到形势极其严峻的冲击。

唐翘卿虽然曾任“汇丰银行买办”，当他致富之后，并没有去做“洋奴”，而是在各方面都以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抱负与洋行进行竞争的。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表现在“振兴中华茶业”上。当洋商在欧战后卷土重来，企图凭借他们的优势，打算摧毁“在经营方式和制茶工艺都是落后的中国茶业”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把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起来，成为规模宏大的跨国茶业公司——华茶有限公司。

为了发展祖国的国际茶叶经营事业，唐翘卿将名下的“谦顺安”、“恒顺宏”等茶栈及其分支机构来一次大合并。1919年（民国八年）“华茶有限公司”成立了，由第十六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总行设在上海博物院路十六号（旧地名），美国分公司由唐叔璠之子唐乃添主持，香港分公司由唐伯璠之子唐乃祥主持。

在工艺方面，唐翘卿迅速引进了新式的制茶机器，把手工制茶改为机械制茶，更新了包庄，增加了新的规格和品种。另一方面，积极培育、推广优良茶种和原茶的焙制方法。（他的一位堂侄唐远干曾受聘赴伦敦传授制茶工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了抗战前夕，华茶公司的业务在国际上获得极佳发展。在国内，基本上击退了“西冷红茶”的进攻。

当年，华茶公司经营范围之庞大，几乎垄断了整个美洲市场。这一点，连外商也相形见绌，连英资怡和洋行、美资天祥洋行和英美合资的旗昌洋行那些经营茶业的买办们，也称誉唐季珊为“茶叶大王”。

唐翘卿不但倾尽全部财力和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去支持“华茶”，并且以八十岁高龄经常亲临指导、决策参与外商洽谈工作，积劳成疾，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病逝上海家中，享寿八十五岁。

抗战胜利后，“华茶”把因战事而停顿的茶业经营工作，重新向欧美大陆扩展，并且在台湾成立了分公司和分场，由唐季珊亲自主持，其间虽有孔、宋家族的强行附股，仍然没有减弱她的业绩。今天，“华茶”纳入了国营，她的业务和成就更是“蒸蒸日上”，前途无可限量，中华民族的种茶事业、制茶事业，正在大步向前。

热心公益事业

孙中山先生曾说：“华侨是最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因为他们多数出身贫苦，在海外的毕生奋斗中受尽了侮辱，他们在有生之年，都渴望见到祖国富强，看到家乡兴盛。唐翘卿本人虽不是华侨，但是在一生的创业中，同样是历尽艰辛的。他在成为殷富之后，对于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向来是慷慨资助的。他对于家乡或外地的近亲，每年都给予生活上的资助，对于社团公益组织是积极参与的。他是上海“广肇公所”的创办人和会董，有关上海的社会公益事业例如“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等大小慈善机构，他和唐景星都是赞助人。他自幼家贫失学，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他不但积极遣送子

侄们去“外国留学”。在国内他资助了上海格致书院、英华书馆，希望下一代人都学到新式文化。唐家村在民国初年兴办的“大学堂”，他也是赞助人之一。对于家乡的其他建设，例如光绪十六年重修花堂庙碑文中，他是“汉口劝捐首事”，唐景星是“开平劝捐首事”。光绪后期，他因乡人每逢赴港必绕道澳门，深感不便，在他的倡议及赞助下，与唐逸川（唐绍仪长兄）联合上栅乡人合资购买一只小火轮，取名“都益”，专程航行由香港经金星门到上栅，而附近的下栅、会同、东岸、淇澳、唐家、鸡柏各村的旅客及货物都可以随船往返。为了航行的安全，还配备了小炮、快枪等武装护航。

现存于大同路的“翹卿家塾”，建于民国初年，是专门为培育本房子弟而设，延聘名师宿儒教授经书，凡本房子弟，书费、杂费、学费全免，赤贫的还可以酌情补助。这种属于义务性的私塾在唐家村内有多处，而经济来源几乎都是由“买办们”资助的。这说明了，当年出身贫苦，靠艰苦拼搏而发迹的民族资本家，是希望下一代人有更好的文化素养去为家乡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的有益事情的。